

唐宋名家文集

欧阳修集

国学经典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学经典

唐宋名家文集

欧阳修集

李之亮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名家文集. 欧阳修集/(宋)欧阳修撰;李之亮注译.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
(国学经典)
ISBN 978-7-5348-3286-4

I. ①唐… II. ①欧… ②李… III. ①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唐代②古典文学—作品集—中国—宋代③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北宋 IV. ①I214.01②I26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1588 号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开本:640mm×960mm 1/16 **印张:**20

字数:252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版次: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唐宋名家文集·欧阳修集

前言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享年六十六岁。他很早就死了父亲，是年轻守寡的母亲把他一手拉扯成人的。当时欧阳修的叔叔欧阳烨在随州（今湖北随县）做官，安葬完父亲之后，欧阳烨便把孤儿寡母接到了随州勉强度日。欧阳修的母亲是一位贤惠而懂大礼的妇女，从欧阳修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他认字读书。当时的欧阳修因家境贫寒，经常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由于欧阳修天生颖慧，很快大有长进，而且很有主见。据他自己回忆，十岁的时候，便经常到南城一个富裕之家借书看，其中有一部韩愈的文集，对尚在少年的欧阳修影响极大。他后来成为宋代文学改革的旗手，成为文坛的盟主，和当时似懂非懂地阅读了这本书有必然的联系，这是他当时没有想到的。欧阳修十七岁时参加地方考试，因为赋文出韵没有考中，三年后再考，遂成为随州的贡士，取得了参加礼部会试的资格。然而次年的会试，又没有考中。回到湖北的欧阳修听说朝廷下放名臣胥偃到汉阳军（今湖北汉阳）担任知军，便带着自己认为较为出色的几件作品到汉阳求见胥偃，胥偃看罢，“大奇之”，决定帮助这位年轻人实现他的人生梦想。胥偃任满时，将欧阳修带到京师，次年春季参加了国子监考试，得了第一名；同年秋季赴国学考试，又考

了第一。第二年即天圣八年（1030年），朝廷举行会试，欧阳修再次夺魁，取得了“天下第一”的“会元”，这离人们经常说的“连中三元”只差最后一步了。可惜殿试时，被一个叫王拱辰的年轻人拔了头筹，而他仅排在第十四名。当年，欧阳修被派往洛阳，担任了西京留守推官。这一年他还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就是把胥偃的女儿娶进了家。当时担任西京留守的是钱惟演，他手下聚集着梅尧臣、富弼、尹洙等一批有为青年，这段日子，在欧阳修一生当中，一直是最美好的回忆。当然也有令他悲痛的事：夫人生下孩子没几天便病逝了。一年后洛阳任期届满，欧阳修回到京城，参加了学士院考试，被任命为馆阁校勘。在这个职位上，欧阳修有机会接触到非常之多的书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工作，为日后撰写《五代史》和《唐书》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五代史》即后来的《新五代史》；《唐书》即后来的《新唐书》。这两部著作都被列入了《廿四史》）。

欧阳修三十岁时，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时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因言事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被罢免到饶州担任知州。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对此极为愤慨，更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当时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面对这种明显的迫害不发一言。欧阳修愤然修书，斥责高若讷是全身保命的小人，紧接着灾祸降临，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离开了京城。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回到汴京，充任馆阁校勘，参加纂修《崇文总目》。不久到滑州担任幕僚，再回汴京，进入谏院当了谏官。然而他并没有因受过挫折变得唯唯诺诺，依旧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庆历四年（1044年），河北保州军卒叛乱，欧阳修奉命出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这段时间里，朝廷中逐渐形成了以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为首的变革派和以贾昌朝、章得象等人为首的保守派，两派势力角逐相当激烈。不久，杜衍等人相继被罢黜，剩下欧阳修这么个眼中钉，保守派当然不肯干休，于是借其妹闺中不肃一事，把黑手伸向了欧阳修。虽然此案最终的调查与欧阳修并没有牵连，但他还是遭到了不公正的罢免，被放到

淮南的滁州担任知州。此后他在扬州、颍州、应天府等地方官任上辗转了十二年，直到至和元年（1054年）才又回到汴京，次年担任了翰林学士。嘉祐五年（1060年）年底，擢为枢密副使，升参知政事。神宗即位之后，因不赞成王安石推行新法，出任青州、蔡州等知州，熙宁四年（1071年）致仕来到颍州居住，次年病逝。

介绍完欧阳修的生平，接下来理当就其文学的成就加以叙述，但我不想就事论事，就文学论文学，而是想就北宋那个值得我们思考的时代，那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登峰造极的时代说几句感想。我想说的只有两点，这两点都与欧阳修有关系，又不专门就他而论。

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是欧阳修生活的时代大背景，包括政治背景和文化背景。之所以要先说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过某些论文，作者并不了解宋朝是个什么样的朝代，便津津有味地分析起宋人的诗歌有何特色，散文有何特色。这样的论文，更多注入的是研究者本人的好恶情感，心理学上叫做“代入”，因此只能是无根的游谈，因为它脱离了产生这样或那样文学伟人和伟大作品的土壤。要想把古人诗文的精华嚼出滋味，不了解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不可能做到的，这正是前贤要强调“文史不分家”的原因。在文和史两者中，文，就如同地里长出的庄稼，史，才是孕育诗文的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地，就长什么样的庄稼，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不少的研究，还停留在只说庄稼不顾土地的层面上。看庄稼很容易，拿在手里掂量一番，怎么都能品评几句；看土地却很费力，需要花很多时间，走很多路，出很多汗，甚至脚底板要磨出血泡。然而只见庄稼不见土地，毕竟是靠不住的。

欧阳修究竟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唐朝是个十分强盛的王朝，其实这仅仅说对了一半，因为从安史之乱开始，这个曾经强盛的王朝就开始大踏步地往下坡路上奔跑，尽管肃宗费尽死力避免了亡国，武宗时一度有过小小的中兴，但军阀割据的势力越来越

强，中央王朝完全失去了控制他们的能力，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一百年，终于被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彻底摧垮，中国随后进入了一个更黑暗、更分裂、更贫困的五代十国时期。经过五十多年的动乱，赵匡胤才在一片废墟上建立了崭新的赵宋王朝。所以用“崭新”这样一个词，是因为它不仅结束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军阀混战、有枪便是草头王的混乱局面，更重要的是，这个军阀出身的帝王响亮地提出了以仁治国、以文治国的全新理念。从广义上说，宋朝是自汉朝以后真正实行文治的朝代；从比较的角度看，汉代的文治还很不彻底，应该说，除了汉景帝之外，其他汉代帝王的统治，并没有真正把“仁政”付诸实际。唐朝是个崇尚武功的朝代，从一开始建国，就烙上了武人掌权的深深烙印，难怪会出现那么多谁都惹不起的军阀，到最后国家就亡在这些军阀手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孟子所谓“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本理念，只在宋朝一个朝代真正实现过。用现在的话说，中国历史上最重视“人权”的王朝，只有宋代。赵匡胤的治国理念，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重视民命，以仁治国。他的仁治，和刘邦、李世民“与民休息”的权宜之计有着根本的不同，他是把民命真真切切放在心上的仁圣之君。纵观宋朝三百多年，冤杀的志士君子只有靖康时的陈东、欧阳澈和绍兴时的岳飞父子，加起来不到十个人，而且都出现在非常时期，出于非常之目的。谁还能找出比宋朝杀人更少的朝代？就连对待宋江那样的“草寇”，都采取招安的手段，一旦归顺朝廷，随后便委以官爵。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仁”的前提下，宋朝实行的是法制，这一点从太宗、真宗时期设置提点刑狱官、仁宗时陆续颁布的《天圣编敕》、《景祐编敕》、《嘉祐编敕》就能体会出来。所谓提点刑狱，即设在各路（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省）严格复核大案要案尽量不冤杀无辜的官员；所谓编敕文字，大部分是官员们在断案时遇到法典无据而申报朝廷裁决，由皇帝补充的带有指导意义的处置意见。宋代的朝廷大事，很少由皇帝一人说了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采

用集体讨论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下来。尤其是在北宋，政治的透明度相当的高。宋代官员的任命，采取举荐连坐的手段，不敢说没有后门的存在，但连坐这条绳索，对于举荐官员的人来说，无疑是一道紧箍咒，使他在举荐某人之前必须保持冷静、谨慎和克制。宋代的军队牢牢控制在文臣手里，连主管军队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和枢密副使，都是由文臣来担任的；武人在宋朝的地位相当低下，这一点与唐朝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地方路分中的经略安抚使、转运使、提点刑狱官，绝大多数都是文臣，州郡中也采用文臣知州府事的模式。所有这一切政治体制，都保证了文人在宋代的崇高地位。在宋代帝王看来，文人执政不仅可以有效防止出现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还可以有效地保障朝廷仁政的推行，因为文人毕竟是些读过圣贤书的人，如何实行仁政，他们心里应该很清楚。欧阳修生活的主要时期是仁宗时期，仁宗是当时和后世公认的最仁义的一位君主，其后的英宗、神宗，也都不是昏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幸运的。这就是北宋前期的政治大背景。

说这些与欧阳修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宋朝开创的前二十多年，还处在南征北讨的阶段，直到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俘虏刘继元收复了北汉，国家才大体上安定下来。在这个时期，太宗已经命文臣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大型类书。到了真宗景德年间，与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国家进一步安定，文人的地位也随之进一步提高。当文人成为社会主体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为世人高度关注的文人群体。欧阳修中进士之后做的第一任官是河南留守钱惟演的幕僚。钱惟演在当时有文坛盟主之称，这就注定欧阳修从一开始就交上了幕府红莲的好运。众所周知，钱惟演是“西昆体”的代表人物，也就是说，如果欧阳修在钱氏的奖拔之下按照老路子走下去，是不可能达到他后来那种境界的。更值得庆幸的是，钱惟演幕下还聚集着尹洙、富弼、梅尧臣等有识之士，当这样一批人聚在一起时，彼此的人生志向和对文以载道的渴望，使他们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

种共鸣，是基于他们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他们需要用文章这种手段来参与广泛的社会变革。应该承认，对国家命运忧虑、用文章手段参与广泛社会变革的人不自欧阳修始，早在太宗、真宗时期，王禹偁就试图将文以载道的大旗打起来，其后的柳开、穆修也为此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可惜他们当时势单力薄，缺乏遥相呼应的合力，当然也就无法与占据文坛主流的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抗衡。而欧阳修得以露出头角，则是综合了许多有利因素。首先我们不能否认，这与钱惟演对他的提携奖拔是分不开的。以前不少人都把钱惟演和欧阳修判然划在两个对立的阵营里，而忽略了二人在文学上的师承关系，那是不客观的，也是违背欧阳修本意的，因为欧阳修一生都没有忘记感激钱惟演，尽管二人对文章功能的认识并不相同，但欧阳修从没说过钱惟演一句坏话。《四朝国史·欧阳修传》说：“调西京推官。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撓以政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学。”如此特殊的待遇，不是每个幕僚都能享受到的。正是由于有钱惟演的倾力提携，欧阳修的文名才能在等辈中骤然鹊起。

其次，文士相高，也不能不说是欧阳修文学地位提高的一大因素：欧阳修对尹洙、梅尧臣等人的揄扬固然增重了他们的声价，而尹洙、梅尧臣等人对欧阳修的揄扬和维护，又反过来把他的文名推得更高。再加上欧阳修的几位老丈人胥偁、杨大雅、薛奎在士林中的广泛传播（胥夫人死后，景祐元年，欧阳修又娶了当时名臣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一年后去世。再娶枢密副使薛奎之女，与上面提到的那个王拱辰成了同门女婿），自然形成了欧阳修名气日重的大势。现在我们能体会到采取那种单打独斗的方式的王禹偁、穆修，不可能成为文坛领袖人物的根本原因了，这就叫“势”。任何事情，不借助“势”是很难成功的。对欧阳修来说更巧的一个“势”是：文坛霸主之一的刘筠在真宗末年先死了，杨亿在丁谓做宰相之后也莫名其妙地死了，钱惟演被刘太后从西京留守贬到随州，不久也郁郁而终。在这种

形势下，羽翼丰满、蓄势待发的欧阳修接替他们登上文坛盟主的位置，也就不足为奇，而且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用现在的概念说，此时的欧阳修取得了“话语权”。这种后天的优势，与他本身具有的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有机地结合起来，再加上他在官场上以往无前的大丈夫气概，使他在文坛上的崇高地位越来越巩固。

以上这些属于“外势”，单有外势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内因。我以为欧阳修之所以成为欧阳修，和他年轻时对前朝历史的辨析和思索是分不开的，人们在研究欧阳修文学成就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他在史学上的巨大贡献。他用了半生的精力写作《五代史》，写作《唐书》，也是成就他卓然大家的必不可少的内因之一。人们常说“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对于欧阳修来说，唐朝和五代，不也是宋代的一面镜子吗？他在广袤丰厚的历史中徜徉和思考，对忠奸善恶、强弱进退以及何为国家民族利益、何为团体个人利益等问题的感知，当然要比普通人高出许多。对文人来说，有什么样的积累和境界，就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这是只可意会而无法用数据来统计和衡量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前面喋喋不休总是强调大背景的用心。我们无须把欧阳修看成天生的神人，他少年时期的作品，比西昆还西昆，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有人不信，看看他给胥偁等人的几封信就清楚了。可贵的是，当欧公一读到韩愈的文章，看到韩愈如何用文章作为武器，为自己的信仰高呼、为国计民生呐喊、向不合理的制度发起攻击和挑战时，他豁然明白了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与尹洙、梅尧臣等人的切磋，与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的交往，更增强了他选择用文章作为载道行己之物的决心。同时也应该看到：欧阳修最终成为受人尊崇的文坛宗主，也是走过漫漫长路的。可以说，直到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担任当年会试大主考时，才最终确立了不可撼动的地位，因为他这一年的“话语权”是绝对的。

说到这里，我想简单概括一下：第一，由于宋朝确立了文治国

策，文人才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文人占了社会的主流，才有了文坛的盟主，而最早出现的盟主必然扮演着“过渡”性质的角色。杨亿、刘筠、钱惟演之流都是朝廷里的高官，且处在国家刚刚稳定的时期，要求他们把文学作品作为匕首和投枪，显得有些强人所难，而欧阳修则不同，他进入仕途，恰好是国家稳定、国内矛盾日益凸显的时期，如何肃清吏治、如何富国强兵、如何克服国家稳定之后随之而来的种种弊端，便成为他们这批有社会责任心的士子思考的重大课题，于是他们的文章就容易有的放矢，切中时弊。欧阳修在知谏院时的一系列奏章和那篇激动人心的《朋党论》，把当世文章的导向一下子扭动了一百八十度，他身边聚集的后进之辈越来越多，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逐渐取代钱、刘而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甚至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肯定和赞扬。第二，文学革命需要旗手，也同样需要浩浩荡荡的生力军。既然赵匡胤顺应历史潮流，奠定了文人政治的基础，文坛旗手和巨匠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即使没有欧阳修，也会有其他人站出来扮演同样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是在一个良好的大背景下奋然挺出，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说得再明白些，就是说宋朝的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群体性运动，是众星璀璨托起欧阳修一轮明月的局面，归根结底，还是不能忽略那个造就盛世文学的文治时代。因为欧阳修也好，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人也好，都是所谓的庄稼，那个值得赞扬的文治时代，才是孕育出成片好庄稼的丰饶土壤。

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还是离不开那个造就盛世文学的时代。这样的时代最起码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要有一大批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士子，二是要有一个让人说话而不轻易将人置于死地的政治环境，三是要有一个蔚成风气的文化氛围，四是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文学作品面世。能够同时具备这四个要素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鲜得一见，历史上更多的文学巨匠，都属于单打独斗

式，无法形成一个文学大气候。比如战国时的屈原、魏晋时的陶渊明，乃至唐代的韩愈，都是孤独无助的求索者，身边没有或很少有同道之人；他们所处的时代，要么是不让人讲话的时代，要么是无视人讲话的时代，不具备形成强势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土壤，自然也就不可能出现大批高质量的文学作品。宋代则不同，特别是在北宋，文治使士子们极大地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珍视，他们真正有了一种主人翁的感觉，而不再是暴力统治集团门前的花草和宠物，或者在权贵门前讨饭吃的乞丐。有了这样的良好人文环境，士子内心的尊严和使命感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然后他们得以将这些升华了的理想通过文章的形式释放出来，注入到社会现实当中。这样的人多了，便形成了气候，占据了主流，便出现了一个盛世文学的辉煌时代。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那个时代，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时代几乎只有宋代：统治者充满仁性，士子充满理性，他们共同把孔、孟的精髓发挥到极致。尽管二三百年间也出现过浊流和阴风，但这个文学盛世，是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去开掘和研究的，这里所说的“根本”，还是指那个时代的人文大背景。

对于宋朝的文学，不少人认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宋词，“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顺口溜，几乎人人都知道，这实在是一种喧宾夺主的不客观评价，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误读。宋词的直接来源是民间俚曲，唐朝时得到士大夫的加工和改造，盛唐以前的主流文化中几乎没有这种文学形式，直到唐王朝衰落、士大夫意志消沉之后，词才在士子的交往中出现，晚唐时期渐多，五代十国时期，大盛于南唐和西蜀，中原士子还鲜有涉及。沿着这个脉络追寻，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学形式在经过士子们的加工改造之后，连俚曲原本具有的清新色彩都被抹去，剩下的几乎全是无聊和颓废，酒边案头、花街柳巷成了词曲最集中的场所。从现存的宋词看，除了苏轼、辛弃疾等为数不多的豪放派词作之外，大多情绪低靡，符合孔夫子定义的“郑卫之音”。

这样的东西，怎么可以作为一代文学的主旋律呢？这就如同新中国的文艺，有谁会认为那些主要出现在酒吧、舞厅里的“通俗歌曲”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呢？宋代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仍旧是载道而行的散文和诗歌，而词不过是聊且一笑的时尚小调罢了。宋朝真正有为的宰相重臣都很少写词，只有像晏殊那样的人，才拿写词当正经事干，难怪王安石瞧他不起：身为宰相而沉溺于小词，这样的人要能把国家治理好才算见鬼呢！如果我们把《全宋词》、《全宋诗》、《全宋文》都翻开，不难发现，宋朝真正闪光耀眼的，还是那一篇篇浸透着仁人志士爱国情怀，充满着对社会对人生对科学深刻思索、对百姓对民族对国家命运焦虑、对经学勇于探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优秀散文。宋诗作为散文的羽翼和附庸，也具有相同的特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宋代的诗文成就是群体性的、时代性的、高水准的。明朝人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是件既好又不好的事。说它好，是因为编者总体的感觉不错：先秦之后的散文要属唐宋；唐宋的散文精华按比例切割，唐占四分之一，宋占四分之三，基本符合实际。说它不好，是因为它所选的宋代六大家给后人带来了一种局限和误导。首先，宋代散文巨擘绝不只这六家；其次，选择的态度上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三苏、曾巩、王安石都是欧阳修的弟子，独立于欧门之外未经欧阳修揄扬的人，一个也没能进入他框定的“大家”行列，这很显然有失公平。后学之人不明就里，沿着这个框架去读书、去研究，结果把目光都集中在了这几个人身上，但是，这所谓的“六大家”果真是宋朝散文成就最高的代表人物吗？恐怕也很值得商榷。我们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两个疑问：一、宋朝的散文，编者都细细读过吗？二、确定一位作者是否“大家”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宋人的原著，不妨翻开《四库全书总目》，看看清人的提要，或许能给我们不小的启发。该书卷一五二田锡《咸平集》提要说：“当时已重其言，故其没也，范仲淹作墓志，司马光作神道碑，

而苏轼序其奏议，亦比之贾谊。”同卷韩琦《安阳集》提要说：“其辞气典重，敷陈剴切，有垂绅縉笏之风。”尹洙《河南集》提要说：“所为文章，古峭劲洁，继柳开穆修之后，一挽五季浮靡之习，尤卓然可以自传。”范仲淹《文正集》提要说：“贯通经术，明达政体。”苏颂《苏魏公集》提要说：“平生嗜学，自书契以来，经史九流百家之说，无所不通，发之于文，亦多清丽雄贍，卓然可为典则。”司马光《传家集》提要说：“光大儒名臣，不以词章为重，然即以文论，其气象亦包括诸家，凌跨一代。”卷一五二刘敞《公是集》提要说：“合众美为己用，超伦类而独得。”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像宋祁、刘敞、沈遘、韦襄、吕陶、文彦博、张方平等文集提要中，无不啧啧赞美之词，这正是我上面说到的“群体”现象。可惜由于《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影响，后人大多把目光集中在那几个人身上，忽略了对其他大家作品的研究。我始终认为北宋散文能卓然千古，属于一个时代现象，而不属于个人现象。

2007年12月，四川巴蜀书社出版了我耗费数年写成的《欧阳修编年笺注》。该书480万字，共8册，是第一部全面整理详细注释欧阳修所有诗文的作品。这部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当然，这也是我放弃了所有休息时间，用损害健康为代价努力完成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很简单，我喜欢宋朝那个真理第一权势其次的朝代，喜欢那个时代里敢怒敢言的大君子。应中州古籍出版社之约写这本小书时，距离《欧阳修编年笺注》的出版还不到两年时间，那种劳累，那种欣悦，那种做完一件大事的惬意，种种感觉，似乎都还没有散去，所以又情不自禁地啰唆了起来。时间仓促，书中还有理解偏颇或译文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李之亮

2009年8月

